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集《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12_艾滋病时代, 我们怎样去调查性行为?

作者: CATANIA等 翻译: 董研 来源: 《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类别: 论文集《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日期: 2005.07.02
今日/总浏览: 1/1758

潘绥铭主编: 《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

艾滋病时代, 我们怎样去调查性行为?

笔者查阅了20世纪90年代有关方法论研究的文献中提供的资料, 包括公开发表的和未曾发表的, 在此基础上, 对这些材料中涉及研究成年人性行为的研究方法做出了评估, 我们尤其关注的是可以传播艾滋病的性行为。在第一部分, 本文对近期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的调查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在艾滋病调查中常见的有关性行为的问题。在第三部分, 笔者关注的是被访者自述性行为的信度和效度, 自述性行为变化的效度; 预测了所选择的调查方式; 指出了测量误差; 以及对性行为产生测量误差的一些主要影响因素, 它们包括被访者的个人原因、选择的调查方式和访问员的变化。

性学调查

本文大部分篇幅讨论的是会传播艾滋病的性行为, 但这一部分我们要关注的是人类其它涉及性问题的调查。有关性的调查可以粗略地被区分为两种类型: (1) 包含各种性问题的普查; (2) 以健康问题为重点的调查, 这类调查通常会提及到艾滋病病毒(HIV)和避孕的方法。到目前为止, 第一类的性问题普查只成功完成了两例。它们代表了美国成年人的典型状况, 分别是“国民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1994)和“国民艾滋病行为方法论调查”, 后者的调查报告尚未发表。至于第二类调查, 也就是有关健康问题的性调查, 数量繁多。这类调查最初关注的是处于生殖期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生殖健康问题。之后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与性病/艾滋病相关的性的问题。

在性病/艾滋病的研究方面, 性行为调查为流行病学中的行为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流行病学中的行为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描述性病/艾滋病在社会和地理形态方面的分布、传播和预防, 以及在一段时间内, 疾病扩散或者缩减的变化; (2) 收集受感染者更多的信息, 以研究性病/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以何种方法可以预防(例如, 可以研究处于特定社会阶层的人们为何会与其他阶层的人发生性行为); (3) 建立解释模型, 用以说明性病/艾滋病的发生、维持和变化的模式过程; (4) 提出初步的评估方法, 用以评价各种预防性病/艾滋病的计划和各种性教育计划。

流行病学已经进行的大量性学调查中, 许多都涉及到性病/艾滋病的研究。普通人群、同性恋者群体、男两性恋者群体都曾经作为这些调查的总体, 从中进行抽样研究。有关青少年的全国调查, 一直关注当时有代表性的健康问题, 近来就对性病/艾滋病投入了更大的注意力。另一项关于家庭发展的全国调查, 同样致力于估算18—44岁的女性人群中, 感染

性病/艾滋病的比率。

已经发表的大规模性学调查报告，大部分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类研究在进行行为评估时，都低估了性行为实践中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部分人群不愿向他人透露有关自己性问题的内容，或者只向访问者提供部分的信息。举个例子来说，在艾滋病时代，人们是否使用了安全套，我们也许就无法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因为，一些特定的行为也许会被应答者加以渲染和夸大，目的是与社会赞赏的行为达成一致。因此，对于过去所进行的调查，一个最普遍的批评就是，他们收集到的关于性的问题的答案，存在的偏差是不可知的。过去在选择访问员时，没有注意协调他们与应答者或者被访者在性别、种族、以及其它潜在的可能相关的社会统计学方面的特征。最近开展的国家艾滋病行为调查是个例外。在这项调查中，给拉丁裔女性应答者配备了相应的访问员；在访问讲西班牙语的人时，访问员是会说西班牙语的人。过去的调查者已经使用了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包括电话访问、面访、当面发送自填式问卷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太多的试调查，以研究如何开口询问有关性的问题，因此，调查者往往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和以往的经验进行研究。而那些经验都是来自于他们在开展不涉及性的话题的调查时（例如，健康、政治、消费行为等），所采用的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虽然大部分调查督导员会检查调查员使用的方法和工作程序，但是督导的检查程序可能并不适宜。而且，目前规定的程序通常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并没有告诉你什么才是适合此研究此问题的恰当做法。对于大部分性研究工作者来说，他们从不考虑什么样的工作程序是最好的方法，只是很简单地认为他自己所用的就是最好的方法。

为何在性调查的领域，实施或者发展新的方法论工具均进展缓慢？这可以部分归因于调查研究人员对于最新流行的方法论工具过于保守。有经验的调查人员都知道，那些看起来有重要进步的方法，在实际应用时并不一定能够起到作用。那么这种思想导致的一个工作态度就是等待。人们要等待出现足够多的证据来验证新方法的优越，这时他们才会使用这种新的方法。不幸的是，在人类性行为的研究领域，类似的证据是很难收集的，那么，绝大多数调查者认为，谨慎的行为就是使用已经被时间证明了的优秀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已经在其它的社会调查研究领域中发挥了很好的功效。这看起来是一个谨慎的策略，但它带来的问题是，如此保守的工作方法又怎能推动方法论的进步呢？正如历史经常告知我们的，倡导变革的人物经常会遭到批评。那么，积极推动在艾滋病流行病学领域进行方法论研究革新的人，也会倍受争议。

虽然方法论的革新没有跟上艾滋病流行病学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但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对性问题的评估工作已经出现。其它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结果，也为这个领域提供了相当的资料。近来，我们完成了一个全国性调查——全国艾滋病行为方法论调查（National AIDS Behavioral Methodology Survey, NABM），其调查对象是18—49岁的成年人（样本量=2030），调查的内容包括结构化的问卷和被访者的特征，而且对应答者进行了一定的比例分配和控制，以便能够涉及到有关性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艾滋病的问题，婚外性关系，性功能障碍，堕胎，强奸等。此项“全国艾滋病行为方法论调查”将被扩展，用于更详细地研究美国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群的性学调查中的方法论问题。在目前许多的性学调查中，已经给予方法论问题足够的关注。例如，在多种族聚居区的艾滋病调查和旧金山同性恋群体的调查中，都曾经使用请被访者自述其行为变化的方法，作为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而且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验证。全国艾滋病行为调查，检验了人们对于“性”这个词的理解。还有，一个三人研究小组的调查者开展了实验性的工作，研究人们自己陈述其行为所产生的偏差，以及如何使用新的方法开展调查工作。还有一些大的调查中心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性实验工作（例如，全国舆论调查中心，密歇根调查研究中心）。

尽管有关新方法的研究大量涌现，但目前仍然没能形成一套固定的规则，教给我们在此类调查中应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以及如何判断调查方法的优劣（我们已经掌握的一些规则除外）。有关人类性问题的调查方法还没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我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改变现状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要做好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仅靠学习原有的东西是不够的。而且，性调查方法论研究的特点是，它是需要被重复进行以求验证的调查。因此，本文进行文献综述的目的，是介绍读者去学习这个领域，为读者提供一个近期研究成果的回顾，包括一些未曾发表的材料，以便规划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进度日程。

与艾滋病有关的行为调查

虽然在调查研究的很多领域，都渗有调查者个人的主观偏见，但是研究者在研究艾滋病问题时，尤其是追踪与传播艾滋病病毒相关的性行为时，是否存在偏见的问题就特别值得关注了。如果我们在图书馆查阅以往研究性行为的文献，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字里行间都掺杂了研究者对于应答者的特征、信仰和性行为等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参与性的偏见。

调查偏见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被访者的不合作，或者说拒绝参与。在访谈员刚开始与被访者联系时，大多数被访者就会表示不愿意接受访问。尤其在电话调查中，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因为这时，被访者很容易表现他们的冷淡态度，只要挂断电话就行了。在全国艾滋病行为调查中，我们发现，80%的拒访发生在被访者知道这个调查是关于艾滋病的项目之前。

各种不同特征的人群都在一般的意义上拒绝接受访问。此外还有一种拒访，它发生在访谈员的访问提及敏感话题之后。前一种拒访会令研究者产生更多的偏见，尤其当研究需要从不同民族和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抽样时。1995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利用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供的语言服务。他们的同声翻译把英语的问题译为被访者的母语。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为今后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可行的方法，来提高不讲英语的人群对社会调查的参与程度。

在上文中，我们从四个主要的方面，谈到了测评性行为时产生测量误差，或者说存在调查偏见的原因（拒访、被访者说得过多或过少、二次测量的信度）。在下文中，我们还会具体分析应答者、测量方法、访谈员、收集资料的方式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测量误差的。艾滋病研究中，测量误差是一个引人注目且易于遭受批评的问题。如果存在很高的测量误差，那么在预测某些高危险性的性行为时会发生偏颇，其结果是削弱了流行病学中的行为研究的意义。例如，如果许多没有使用安全套的同性恋者都自述使用了安全套，那么研究者在预测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传播的问题时，其预报的结果就会较真实值偏低。这种不可靠的评估会产生相当多的问题。比如在历时性调查和评估性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检验的是，性行为随着时间的改变发生的变化。但由于那些不可靠的评估，使我们不能确定任何观察到的行为变化是确实改变了，还是由于以前不可信的报告造成的。

在谈论应答偏见之前，我们需要先讨论，请应答者自述其个人性行为，这种方法的信度问题。显然我们的文化禁忌，使我们不可能直接观察其他人的性活动。那么，性问题研究者主要依据的资料就是被访者对其性行为的自我陈述。研究者一方面要努力减小测量误差，更重要的，还应该制定出一些指标，来检测自述性活动的效度。这个指标要包括一个人是否发生了行为（行为的影响范围）和行为发生的频率。

自述性行为的效度和行为的变化

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有许多原因会使被访者自述的性行为和实际的行为之间存在矛盾。个人需要、困窘、担心报复等都可能成为动机，使人们隐瞒他们真实的性行为。还有一些人会对自己真实的性经历夸大其辞。即使是那些很愿意配合，想提供“真实”回答的被访者，也可能已经记不清自己进行某种特定性行为的时间频率了。

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检验自述性行为效度的方法，和一些验证自我陈述的策略，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见。这些验证的策略依赖于生物学鉴定技术的发展，但它们还不能用来评估自述的各种性行为发生频率的正确性。再有，如果用这些技术来检验大规模人群调查的效度，在实际操作中不太现实，而且成本过高。检验应答者自述性行为的效度的研究还是呈增长的趋势，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多起来了。例如，对于被访者自述使用安全套的效度检验，对于可以导致传播性病/艾滋病的性行为的检验。生物学技术的重要发展，被用来检测更多种类行为的频率（从不、有时、总是）。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层次，也许就足够精确了，因为这就可以用来推断，一个人是否肯定不会被传染上艾滋病或其它的性病。

研究者已经得到了有关性病情况的数据。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种由被访者自我陈述的性病发生情况是正确的，那么在艾滋病研究中，这些资料将成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可以用它们来验证被访者自述的其它行为的真实性。但是，先前有一些研究者对被访者自述的效度，提出质疑。1992年，在旧金山做的一个户内随机抽样调查，检验了被访者自我陈述的两种疱疹（面部的疱疹和生殖器的疱疹）和血液中存在的两种疱疹病毒抗体的相关情况。结果分为两类：一种是低灵敏度的结果（血清检验结果呈阳性的人，很少有人自述以前得过疱疹）；另一种是适中的结果（自述以前得过疱疹的人，大多数的血清检验都呈阳性）。这说明应答者对于他们过去的感染情况，存在漏报和多报。

如果研究者们追踪研究一种“艾滋病不协调夫妻”（指夫妻中有一方艾滋病检验呈阳性，而另一方呈阴性），那么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他们都发现了同样的结果：阴性一方的血清转化速度，和他们自述的有效使用安全套的情况，是相互吻合的。这些发现表明，在全球的范围内，被研究者自述的、有保护意识的性行为，与生物学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把这种一致推广到其它的调查领域，原因有二。第一，当这种“艾滋病不协调夫妇”把对他们的调查访问，当作对他们健康服务的替代品时，或者他们接受了研究者重复的劝告，这些都可能使他们更愿意向研究者提供准确的信息。第二，因为参与者受到了有规律地拜访，所以他们的回忆技能也提高了。

作为生物检测技术的替代品，统计方法同样得到了发展。我们可以用统计方法，做一个关于流行的性行为的独立评估。随机列表法就是一个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可以用随机列表法（randomized list technique, RLT），来估计一个敏感行为的流行。首先，从所有应答者中随机抽取两个组。然后，发给甲组的每个成员一个单子，其中包括我们要检测的那个敏感行为。也发给乙组的每个成员一个单子，其中包括我们要检测的那个敏感行为和一组不相关的行为。之后分别计算这两组人填答的数据的均值，并用甲组的均值减去乙组的均值。这种随机列表法只适用于估计样本中某种行为的比率，得不到个体层次上的数据。与通过直接提问法获得的数据相比，随机列表法虽然可以降低测量误差，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每个变量的总体标准差。因此，随机列表法需要比较大的样本规模，来减小标准误差。

请应答者每天记录活动日记，也是一种可以验证其陈述的先前行为的方法。日记验证法的使用，引出了一些有关方法论的讨论。首先，使用日记验证法要假定，日记提供了准确的资料，可以作为检验的标准。但是这需要研究者能够恰当地控制（例如亲手收集日记，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收集），以确保应答者能够每天记录。因为并不是每位应答者都能诚实的，而且按时的，记录他们的行为。也许会出现每几天或者更多天，应答者补记“每天的”记录的情况，这时他们的记录中，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记忆模糊，出现误记。再有，即使上面的问题很好地得到了控制，应答者也仍然可能在每天的日记中有所保留，不记录那些不受欢迎的行为。

访问应答者的性伴侣，了解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他们多长时间有一次性行为，这也可以用来验证应答者自述性

行为的效度。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客观尺度，来检验有性关系的两个被访者，对于他们之间性行为的自述。已经有研究者发现，这些自述会受下列因素的影响：二人关系的稳定程度，二人间存在虐待的程度，二人性行为的类型，对他们进行访问的时间等。这就是说，性伴侣只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关心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但他们不会提供能够评估其自述性行为效度的信息。

当我们希望了解在一个时间段内，应答者对某种行为的兴趣变化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受到质疑的方法——纵向同组法 (longitudinal or panel method)。这种方法是在间隔的两个时间里，对应答者进行两次询问，请他们叙述自己的性行为，然后比较这两套回答。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询问有关应答者行为变化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不会受应答者自我心理暗示的影响（应答者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变化，有一个定势的看法），也不会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流行一种革新的思潮，应答者受其影响，认为自己的行为改变了，而实际上也许没变）。虽然，这种比较两次测量结果的方法，减少了应答者个人主观偏见对其回答结果的影响，但是历时性的纵向研究通常花费较高，而且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仍然需要探讨。

回想法 (retrospective method)，是一种可供研究者选择的最常见的方法。回想法就是给应答者提出直接的问题，询问其行为是否有变化，例如，“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内，你的性行为有变化吗？如果有，是什么变化？”贝克和琼森在1988年，做了一个有关艾滋病预防研究的回顾，他们当时引用了七个使用回想法的研究项目。此后，陆续又发表了一些使用回想法的研究成果。例如，访问者还可以询问，“由于艾滋病的原因，你的性行为发生了变化吗？你做了怎样的改变？”

直接询问应答者行为的变化，给他们同时带来了三个任务：（1）确定他们现在的行为；（2）回忆他们在过去某个时间的行为；（3）比较过去的行为和现在的行为是否有差别。由于是直接询问被访者是否有差别，这种问题会带来额外的偏见，而这在历时性研究中是没有的。例如，如果应答者持有一种成见，认为身处艾滋病时代，或者因为参加了某种研究项目，他们的性行为就应该有所变化。或者如果应答者认为，他们的行为有变化才会被赞扬。那么，应答者的这些想法，就会使他们在自我陈述的回顾中，夸大其行为的变化。

研究者在其它领域的调查证实，相对于纵向同组法而言，回想法易于使应答者夸大对自己行为变化的估计。许多使用请被访者自述其行为的研究，都遇到了这种情况，例如个人健康研究和社会福利分配研究。再有，与客观资料相比，纵向同组法可以提供更多可信的估计。由于研究人员对回想法有比较多的偏见，因此他们经常过分估计了回想法中干扰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使用回想法可以使一个拖沓的项目看起来更有效率。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两种方法，在预防艾滋病的研究中，发挥了真实的作用。我们利用从一项对美国军人的调查（从未婚的20—24岁人中随机抽样）中获得的数据，在两个问题上（安全套的使用变化，一年中总共拥有的性伴侣人数）比较纵向同组法和回想法的效度。我们的结论是，与在其它领域的效果一样，在性行为的研究中，回想法比纵向同组法会产生更多的偏差。

在附录一中，简单介绍了此项研究的方法。被访者是参加了两次访问，且自述在一年中发生过性行为的异性恋者（样本量=889）。结果显示（参见附录一），回想法与纵向同组法相比，产生了更多的偏差。首先，在“性伴侣的个数”的问题上，使用回想法，自述性伴侣的人数减少了的应答者中，大约有半数的应答者（53%），与他们在纵向法中展示的答案不一致。而使用回想法，自述性伴侣人数没有减少的应答者中，只有22%有与纵向法的测量结果不一致的答案。那些声称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改进的人，与声称没有改进的人相比，有显著性的偏差， $\chi^2(1, N=889)=28.0$ ， $p<0.0001$ 。再有，在“安全套使用变化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同样模式的结果。使用回想法，自述更多地使用了安全套的应答者中，36%有和纵向法的测量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显著大于自述在使用安全套上没有变化的人，后者中有20%的不一致。 $\chi^2(1, N=889)=21.6$ ， $p<0.0001$ 。同样，那些声称有积极改进的人，比声称没有改进的人，更易显示出一种个人的偏见。通过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得到的相同的结果模式，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且这种模式在男性和女性，以及不同民族群体中，都能够得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意义。

有些研究者希望测量性行为的变化，那么上述回想法和纵向同组法的比较研究，带给他们的启示是：纵向同组法研究得到的数据更可信。虽然纵向法在许多情况下受到限制，但只要可能，应该尽量使用纵向法，评估行为的变化。

还有一个中间的方法，与回想法相似，是在一个时间内使用的，它产生的偏差比较少，研究者称它为简易同组法 (pseudo-panel method)。在这个方法中，询问应答者纵向的问题，如“你多长时间使用一次安全套？”在调查的最后，再次询问应答者，“在访问之前，你多长时间使用一次安全套？”两次回答的不同就是一个简易同组法测量的变化。与回想法相比，简易同组法得到的关于变化的数据，和真正的纵向同组法得到的数据的相关性更强。

预备调查的必要性

调查者在选用调查方法之前，没有对它们进行充分的预备考察，是产生测量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应答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对于访谈员提出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理解方面的困难，或者对问题有消极的情绪反应。预备调查可以使研究者评估，被访者的这些状况给调查带来的困难。一般来说，研究者会假定，如果被访者回答了问题，就表明他们理解了题目。但是，如果在问题中插入了一些不易理解的术语，那么很可能就会使研究者的估计产生偏差。调查研究中，预备调查被看作是一个标准化的练习，但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和检验各种预备调查技术的效用。康奈尔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199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给预备调查的研究开了个好头。他们不但建立了，而且在经验上证实了预备调查技术的体系。

这些预备调查技术，对于访问者和应答者在个体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1989年，康奈尔大学就提出了这些预备调查技术，对于它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验证这些方法的效度。

康奈尔大学的报告中，没有评估应答者对调查问题的消极情绪反应。依据1993年进行的有关艾滋病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只有非常少的人对于性行为、性态度以及类似的话题，感到不舒服或者说有消极的情绪反应。但是，我们没有评估应答者对于一些更敏感的话题，如种族、乱伦、性功能障碍等，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预备调查中使用的方法之一——焦点组法（focus groups），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研究一些以前没有进行过广泛调查的问题时，调查者需要先与被研究者进行交流，以获得对所研究问题的初步的印象。如何得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是团体舆论的抽样调查中固有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大多数焦点组研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研究者希望得到的样本，能够反映那些愿意参加正式调查的应答者的特征，也能够反映那些特殊的应答者的特征，如一些不能很好理解问题的内容和术语的应答者的特征。

认知的访问，其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理解应答者如何解释问题。专家小组法（expert panels）是一种附加的方法，在设计敏感的、有危险的话题的问题时，它能够发挥作用。

社会调查的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那里，借鉴了一些方法。在实验设计中，可以使用认知理论来研究被访者对调查的反应过程。同时，认知心理学中使用的方法，例如有声思考（think aloud）、过程回顾（retrospective procedure）等，也被用来作为社会调查的工具，用来提高调查的设计水平，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应答者的想法和感觉。1992年的一项研究中，使用认知的方法评估了一项自填问卷的调查，调查内容是研究静脉内用药的病人，如何理解与艾滋病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者发现，应答者在理解问卷中的一些术语如：肛门的、婚姻的、阴道的、确信时，存在困难。

专家小组法，是另一种节省经费且能有效评估问卷问题的方法，但尚未被广泛采用。在一个比较预备调查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成立了一个由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问卷设计专家和调查方法论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结果，研究者发现，和传统的预备调查方法、行为译码法、认知法相比，专家小组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最多。在诊断大量的分析问题时，使用专家小组法和认知法更有效。在确认和区分问题的类型时，专家小组法和译码法取得了更多的一致。

有研究者在1994年，对四项预备调查方法——传统预备调查（conventional pretests）、行为译码法（behavior coding）、认知法（cognitive interviews）、专家小组法，进行了回顾。他们指出，通常情况下，专家小组法在确定问题的数量上最有效。在确定访问者的人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时，只能使用认知法和行为译码法。在诊断分析性的问题时，用专家小组法和认知法。在确认问题的数量、区分问题的类型时，专家小组法和行为译码法取得了更多的一致。

测量误差研究

概述

应答者自我陈述自己的性行为时，有多种情况会使他们的回答和事实发生偏差：（1）应答者拒绝回答某些问题；（2）应答者说他从没有进行过某种行为，而实际上他做过；（3）应答者承认他从事过某种行为，但是自述中缩减了行为的实际发生频率；（4）应答者自述从来没有发生过，调查中涉及到的所有行为。伴随着应答者自述产生的这些测量误差，会影响研究者对行为发生率和频率的估计。因为我们在研究自述性行为时，缺少一个优秀的、标准的效度指标，所以在绝对的意义上，难以探测应答者自述中的偏差。但是当我们比较各种资料收集方式的时候，可以在相对的意义，评估应答者对自己性行为的多报和漏报。

拒答率，即拒绝回答一个问题的人数比率，是一个绝对的量值。在性调查中，它是最经常遇到的一种测量误差指标，相对来讲容易估计。目前的证据证明，由于性调查收集资料的方式不同，自我陈述的偏差也会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应答者发现的，回答没有发生过比拒绝回答一个问题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因此，研究者在比较不同的收集资料方式的拒答率时，还应该包括在行为问题中，回答“从来没有”或者“零”的比率。成年人样本中，自填问卷涉性问题的拒答率，在2%到19%之间，具体由所测量的性行为所决定。例如，“估计去年一年中总共的性伴侣人数”这道题，平均拒答率是6%。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结果都与这些普遍意义上的观察相吻合，但一般来说，性调查中的拒答者（拒绝回答一部分或者所有关于性的问题）与应答者相比，是一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没文化，且性经验（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比较少的人。另一项1993年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回答有关性经历的问题。

1993年开展的另一项调查，比较了通过电话进行访问的，性调查中的应答者和拒答者。结果发现，有些应答者在谈性这个问题时，感觉困难或者很困难，也有一些应答者觉得向别人谈论自己的性问题很容易，那么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拒答涉性的问题。不愿意谈性的应答者中，有3%拒绝回答一个或者更多的涉性问题。而在愿意谈性的应答者群体中，只有1%的人，在涉性的问题中有拒答的情况。再有，应答者对调查保密性的认同，也会影响拒答率。相信调查的保密性高的

应答者中有1%，认为调查的保密性低的应答者中有4%，拒答了至少一道涉性的问题（ $p < .05$ ）。应答者其它方面的一些差异，例如先前参加调查的经历的差异；对西班牙裔的人进行的文化适应的差异研究；以及参加宗教礼拜活动的差异等，对于应答者回答涉性问题的情况，没有产生影响。

再测信度

两次测量的结果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可以在一个标准的时间间隔中（所有的再测信度可以使用相同的时间间隔），评估应答者自述的性行为的稳定性。人们通常都有一种偏见，认为性生活应该出自于感情，而不是有一种固定的频率。那么，对于自述的性行为来说，互为伴侣的两个人的叙述的相关系数，不应该作为检测观察者的信度的方法。

对性行为问题进行再测信度研究的调查者，调查的对象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包括男同性恋者、异性恋的成年人和青少年等，调查的内容包含了广泛的行为领域。在检验男同性恋者和异性恋的成年人的不同的性行为的时候，信度的相关系数从0.3到0.9，甚至还会更大一些。与成年人相比，异性恋的青少年的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更高。也许是因为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性经历比较少，性伴侣也比较少，那么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青少年需要回忆的信息并不多，和给定的时间范围以外的事件发生混淆的情况也比较少。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的变化范围比较大，使我们认识到，在测量甲种性活动时，产生了高信度的方法，并不必然在测量乙种性活动时，仍然具有高信度。因为事件发生的频率不同，留给人们的印象也不同。一般来说，很少发生的事情比经常发生的事情，能使我们记得更好。例如，研究者发现，在男同性恋者的样本中，肛交中插入者和被插入者之间，有很高的信度，因为肛交是一种很少发生的行为。但是相互手淫者之间的信度就很低了，因为手淫是一件低风险且经常发生的事情。

一般来说，与某种行为发生频率的题目相比，是否发生过某种行为的题目（例如，“你做过吗？”），具有更高的信度。有些题目要求应答者回忆的时间比较长（一年），那么它就比短时间回忆的题目（一个月）的信度要低。1994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请注射药物的使用者，回想性地评估，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的行为。研究者研究了时间对于回忆偏差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三个回忆的时间段内（6个月、12个月、18个月），应答者无论是回忆性行为，还是回忆药物的使用，其信度的衰退都呈现出一种稳定的趋势。许多回忆的误差都出现在行为的频数问题上，而不是在是否有过这种行为的问题上。因此，如果使用“有”或“没有”这种定类尺度的变量，而不是直接测量频数，那么以丢失部分信息，或者说不详细为代价，就会得到更高的信度。

二次测量的数据提供了一个途径，使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记忆的技巧，以增进对性行为的回忆。例如，可以通过二次测量的设计，比较能够增进记忆的不同方法的优劣。如果我们假设，应答者向他人展示自我的意愿方面没有差异，那么能够使二次测量相关系数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的方法，就是促进了回忆的方法，或者说就是记忆的技巧。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研究去检验各种信度，如对于某种性行为，测算标准回忆期和各个不同的回忆期的信度的相关系数。这种测算还要在不同的年龄组，不同种族的人群中重复进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有不同层次的性经历的人，要使用不同的回忆问题。总之，性行为的自述有较高的再测信度。但是，对于各种性活动来说，自述频数的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其变化的幅度较大。再有，延长回想期，会使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减小。

应答者对于测量误差的影响

应答者这个变量关系到人的特性，是影响信息提供的首要因素。应答者变量包括回忆的要素、主观存在的误差、个人动机和对问题的理解。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关注与记忆有关的几方面问题：回忆材料的生动、丰富，推论的回忆策略，回忆中情感的影响，此外还会涉及到，自答卷中的偏差和应答者的动机。我们要注意，本部分提到的应答者理解力的问题与后面部分提到的测量工具对测量误差的影响不同（后者参见“术语和问卷结构”部分）。

回忆：生动、丰富、推论的策略

性学研究中，我们目前所知最少的一个领域，是在回忆过去的性经历时，应答者记忆对测量产生的影响。回忆过去的性行为，其困难在于，这种回忆的能力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波动起伏不定的。再有，应答者会在无意识中把被调查时间段以外的内容包括进来，这就增加了评估性行为时产生的测量误差。应答者对自己性经历的回忆，依赖于以下几方面的情况：要求回忆的时间段的长短，要求回忆的事件是否生动，回忆过去事件的任务的难度，还有应答者接受回忆过去经历的任务的动机。

虽然许多应答者说，他们清楚地记得性行为中的重大事件，但是，对性经历的记忆还是可能会受一些原因的干扰。首先，有显著个人特征的性活动，比那些没有特色的、非典型的性活动，更容易被人记得。例如，如果应答者有许多的

性伴侣和多种性行为的技术。那么他们比较难以记忆，某种特定的性行为的发生状况。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发生的事情很突出，对个人有情感的伤害，那么个人会在记忆中压制这类事情，结果是使这类事情也难以被回忆起来。或者说，这类事情最多只能以应答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被表述出来。最后，还有一些事件，是人们特别突出的幻想，应答者会把这些幻想和真实的事情搞混，歪曲了自己的记忆。

由上所述，人们对于性经历的记忆并不可靠，那么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提出性的问题，怎样设置好问题的结构层次，以便能在最大限度上帮助应答者提高回忆的准确性。虽然原有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一些方法，但那些方法几乎都没有得到经验上的检验。1994年的一项研究做出了尝试。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双时间框架问题程序法（two-time frame questioning procedure），用来降低人们回忆时产生的偏差。因为人们都存在一种倾向，用向前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情，这会使应答者把不在提问时间范围内的事情也包括进来。94年的研究证实，在有关健康行为的调查中，双时间框架法带来了更多精确的回答。具体来说，访问员询问应答者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里的同一种行为，而且先提问跨度长的那个时间段。例如，先问应答者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就医的状况。然后，询问应答者再往前两个月的就医情况，而这才是我们真正兴趣的问题。在健康研究中的这种降低回忆偏差的提问方法，还没有在性行为的研究中被检验。性行为调查中，有两种帮助应答者回忆的方法，一种是聚集联想法，指应答者通过回想、聚集自己的性伴侣，来回忆自身的行为；还有一种方法是日记法，它要求应答者记录个人生活事件的日记，把性生活的经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让生活中的事件为回忆性活动提供线索。在物质的使用和性行为之间的联系方面，研究者比较了这两种方法，发现日记法可以增加应答者对自身性行为的报告。

1991年的一项研究，是有关同性恋伴侣去性病门诊就诊情况的，使用了事件历史记录法（event-history calendars），记录每个伴侣自述的性行为的种类和频率。这些记录可以帮助应答者回忆，也可以解释通过行为观察得到的，互为伴侣的两个人之间存在的高信度。但这种方法还没有直接和标准回想法做过比较。在以部分人群为基础的历时性调查中，当应答者有多个性伴侣的时候，研究者使用了伴侣对伴侣的方法，帮助应答者回忆自身的性行为。一般认为，伴侣对伴侣的评估法简化了应答者的任务。尚未有研究比较此方法和聚集联想法的功效。

当应答者进行回忆的时候，他们怎样估算自己的性行为？通常来说，应答者依赖推论的方法来估算行为，尤其是当访问员增长了提到的时间段，或者应答者的某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增加的时候。此外还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分解法（decomposing）和有效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它们已经在不涉及性的研究中使用了。分解法指，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行为发生了一定比率的人被当作应答者，然后把这个比率和扩充的时间的倍数相乘，得到一个更长时间段内的总次数。有效启发法认为，人们对于强烈的、生动的记忆的感知，往往高于实际的发生频率。因此，在应答者计算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行为次数的时候，会夸大一些特别生动的记忆。通常，性研究者不会检验应答者是如何计算他们性伴侣的人数的，也不会检验应答者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如何计算性行为的频数。而且，我们对于影响应答者计算的过程的因素也知之甚少。

回忆：感情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们容易回想起自己某种特殊的性经历。如果人们在某个事件中投入了大量的感情，那么就会提高这个事件的特殊度。与性经历相伴随的幸福或者否定的情绪，带给人们的回忆也是不同的。例如夫妇之间，对性生活满意的人比对性生活不满意的人，会自述有更高层次的性活动。如果我们假设，相比于那些伴有消极情感的事件来说，伴有积极情感的事件，更容易被回忆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两性间自述的性伴侣的差异——女性自述的性伴侣人数少于男性自述的人数。以此作为事实的基础，我们认为女性对于消极性经历的感受性更强。妇女更有可能发生被迫的性活动。1994年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发现，有22%的女性自述，在她们不愿意的情况下，曾经有过被迫的性活动。

有一项研究，调查成年人童年时遭受的性虐待的情况，调查对象是文件中有记录的，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访问员探访这些女性对于自己不幸的被虐待经历的回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自我陈述中没有谈到曾经受过虐待。进一步的访问中发现，大部分没有回忆起不幸经历的人，表现出记忆中的缺失，或者说有关此不幸事件记忆的枯竭。有两个因素影响是否会丢失痛苦的记忆，一是应答女性的年龄，二是她与冒犯她的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受害女性为何不把事情说出来，以及对于不幸事件的潜在记忆丢失机制，研究者们曾经开展过一些讨论。现有的资料显示，当我们依赖于个人回忆自述的时候，很可能大大低估带给当时人创伤的性经历的普遍程度。

通常来说，应答者消极的或积极的性感受，会给他们的自述带来偏差，给他们回忆的特定的事件片段，涂上感情的色彩。应答者接受访问时的情感状态，同样会影响测量误差的程度和方向。这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自我陈述的偏差和偏差的方向性

许多人类性行为方法论研究的学者假定，大多数成年人在自述其个人的性行为时，会有所保留，而不是夸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此种假设依据这样的观点，在人类文化中生活的个体，一般把性活动看作是一种私人的行为，或者看作是一种“不太好”的行为，即人们不应该有这种行为，即便有也不应该有太多。有证据显示，人们的典型做法

是，在自述个人的性活动时，打很大的折扣，即隐瞒一部分的行为。有一项“仿造管道”的实验（更多的细节请参看下一部分“动机”），证明人们自述的手淫、性交、性伴侣的人数和同性恋等行为发生的情况，要少于事实的状况。研究者197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设计的目的是减少应答者自我陈述中的偏差。实验通过前后题目间关联的处理，发现成功的关联，可以提高自我陈述的性行为的层次。此外，还有研究者检验了“自己揭发”的方法，和请应答者回答性行为题目的方法。结果发现，更多的“自我揭发者”自述了更高层次的性行为，而且他们拒答的题目比其他入少。有许多原因，都可能使人们在自我陈述中，隐瞒种族的虐待和性虐待。虽然对于性虐待，我们了解的情况还很少，但是仍然可能存在隐瞒。

与隐瞒相反，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多地估计了某种行为。因为有一些种类的行为，有可能被期望发生。例如，在艾滋病时代，和新的性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使用安全套被看作是一种标准化的行为。因此，应答者会认为，自述没有使用安全套是不可接受的。其结果是，在应答者的自述中，可能对自己安全套的使用情况，有所增加，以便和标准的期望一致。

再有，应答者的性别差异，对自述个人的性行为，有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夸大在有些时候确实会出现，尤其是男性更可能夸大。全国性随机抽样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成年男性，倾向于自述有更多的性伴侣。在有传染病/艾滋病的风险的人群中，男性同样更喜欢自述使用了安全套，而女性自述没有使用的人数更多。这就是说，男人可能是夸大了他们的性伴侣数量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女性隐瞒了部分的情况。研究者认为，延长研究的时段，应答者自述性伴侣人数中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也会加大，如一生的时间和6-12个月的时间。在最长的一段时间中，这种性别差异表现得最明显。

自我公开理论（self-disclosure theory）为理解应答者自述性行为中的各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同时，使应答者在接受访问时自我公开，也是认知控制理论的一个应用。自我公开理论的研究者认为，人们更乐于向他们感觉亲近的人，而不是感觉到威胁的人，倾吐心事。与前一种人交谈，人们往往能够谈得更诚实，谈话能够涉及到更多的细节。许多正在进行的的关键，是确认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能够更诚实地自我公开有关性话题的内容，确认普遍性的因素和变化的因素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

通过调查程序的调节，使陈述中的偏差最小化，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测量自我陈述中的偏差，也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工作策略。后一种类型的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从20世纪70年代延续到90年代，但仍然存在许多测量和概念上的问题。第三种方法是直接评估人们公开自己性行为的意愿，因为这是我们调查中的核心问题。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一些经验上的证实，得出了一些结论。显然，上述这些方法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谁倾向于在自述中夸大自己的性行为。总之，在与艾滋病相关的行为研究中，自我陈述的偏差是一个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在不同性别、年龄、性取向、有感染艾滋病危险的亚文化的人群中，他们会如何自述自己的某种性行为，我们至今对此仍了解得很少。不要认为探访应答者自我陈述中的偏差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它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促进性行为变化的条件的理解能力，和我们评估对行为产生干涉的条件理解能力。

动机

应答者扮演角色，投入研究的动机和程度，是另一个影响测量误差的因素。被很好地调动起来的应答者，会努力思索自己的回答；而没被激发起来的参与者，则可能回答更多的“不知道”和“拒绝回答”，或者不认真地给出一些敷衍的答案。研究者进行过多次研究，检验应答者回答敏感问题（例如性行为或者其它的话题）的动机，如何受告知程序的影响。结果发现，更多的机密性的保证，会提高有关性行为问题的应答率，但起的积极作用比较小。告知应答者此项研究的目的，会减少他们对性问题的拒答。但是当研究的目的与应答者关心的事情相差很远的时候，例如方法论的研究，这时告知研究目的的方法就不起作用了。还有，对应答者大量、详细地讲解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的收益也是很小的，而且讲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应答者对于被告知的内容，到底能理解多少？

199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男性和女性在自述性行为时的差异。研究者认为，男女间的这种差异部分源于误报的动机。通过增加应答者给出正确信息的动机，可以减少这种差异，或者完全消除差异。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研究者组织了一种处理方法——仿造的管道程序（“bogus pipeline” procedure）。研究者使应答者相信，一个生理记录装置可以检测出他们给出的假答案。使用“仿造管道”法，重要的不在于那个装置是否可以真的检测出有问题的答案，而是要让应答者相信，那个装置可以做到。应答者回答了许多敏感的和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包括应答者是否抽烟、喝酒，是否有做运动的习惯，还包括是否使用过违禁药品和他们的性行为。相比于控制组的应答者，仿造管道法的应答者，更可能说出一些敏感的、或者潜在使人难堪的行为。仿造管道法的应答者，自述的性伴侣的平均人数增加了，这是意味深长的。但是，即使男性和女性自述拥有了更多的性伴侣，但是他们两方自述的性伴侣人数的差异依然存在。

我们如何测量应答者提供全面完整的信息的动机？再有，我们是否可以改变应答者的动机，以创造一种可以传导的、能给出诚实的回答的气氛？应答者答题动机的问题，在方法论的研究中，是最薄弱的的一个方面。但在人类性学研究中，应答者动机的问题涉及到参与调查者的关系的核心部分。如果调查的问题包含了敏感的话题，或者调查有严肃而周到的保证，那么可能使应答者产生两种极端的答题动机。也许，定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恰当地评估应答者的动机，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探测应答者的意见。

调查少数民族群体时，访问者是否能够保持客观中立，是调查给他们提出的一项特殊挑战。民族的或种族的因素，对收集敏感的性问题的资料的影响；以及文化的因素怎样与敏感的话题相互作用，降低应答率和访问的质量，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还研究得很少。在少数民族群体或亚文化群体中进行性行为的调查，是降低测量误差研究方面的一项特殊的挑战，同时，研究者还需要特别地注意使用的语言、理解和问卷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此外，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歧视，或者在特殊地区（如外来移民聚居区）生活的共同体，可能会故意误报，或者有意夸大和隐瞒。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包括术语、问题的措辞、问题的结构、顺序的影响。工具变量经常与应答者和访问者的特点相关联。例如，有一位访问者，他不喜欢某一种特定的性行为的方式，那么当他向应答者提问这种特定的行为时，他就会巧妙地表达一种对它批判的态度。访问者持有的这种否定态度会给应答者提供些暗示。在这个例子中，访问者的反应会降低应答者正确回答问题的动机，而且会增加应答者自我陈述时的偏差。最后，测量工具的变化、长度和复杂性，给应答者的记忆和完成答题任务的动机设置了不同的要求。

语言是一个操作系统，通过它，问题和答案在访问者和应答者之间转换。那么，应答者对访问中使用的性的术语的理解，当然会影响测量误差。因为问题的术语和应答者的理解会相互影响，我们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理解的问题，而不是应答者对测量误差的影响。

问题的前后关系

所谓问题的前后关系，指的是问题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对应答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影响，特别是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前面谈到的调查试验和自我公开的理论表明，在评估性行为的时候，题目的前后关系会对测量的偏差产生很大的影响。问题的前后关系对于调查项目这种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因素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使应答者感到有威胁性的问题，会降低他们自我公开的真实程度。问题带有判断性或倾向性，是影响应答者产生偏见的因素之一。如果问题暗示，人们是反常的、不被社会接受的、不健康的、无知的、放荡的，那么应答者可能不再会愿意诚实地提供有关个人的信息。这些否定的暗示可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看起来无伤大雅的题目，因为它们只描述了行为的一个方面（如，你使用安全套吗？），而暗示着不履行这个特定的行为就是不可接受的。

一般来说，如果访问者的陈述中含有暗示，认为应答者的行为是标准化的，或者是提供给应答者一种有支持型的、不带判断的问题，那么应答者会公开更多的个人信息。例如，如果一个已婚者假定，大部分人相信婚姻应该是一夫一妻的（绝大多数人也确实是这样），公众认为私通违反了调节婚姻行为的道德规范。但是，若访问者能够在承认婚姻道德的同时，指出即便是强烈地相信一夫一妻的人，也有可能做出出界的事情，即承认人性的弱点。那么，应答者会在访谈中感觉更舒服，才可能公开自己的婚外性关系。这个假设从1970年的一项调查中得到了支持。研究发现，访谈员先用积极的语言和态度描述婚外性行为，然后再询问应答者是否有这种行为，这种做法使自述的婚外性行为有所增加。剧本作家的策略与此相似，他们是围绕着其它性行为构建婚外性。统治成年人性行为的道德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成年人中的处女是不受欢迎的和反常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个人也不能表现出过多的性的活力，因为这样他人会认为自己的两性关系混杂。因此，访问员应该在性行为的道德规范的范围之内，在情感上支持应答者。这可以提高应答者自我公开中的极限值。

最近的一项方法论研究继续探索了这些问题。它是一项大型的全国随机调查，包括一系列的实验，调查对象是18-49岁的成年人（不加权，N=2030），调查方式是电话访问。应答者被随机分配到各个实验组中，以检验标准型的问题和更多支持型的（增加的）问题的差异（详见附录二）。

这里我们只举三个例子：评估青春期时处女的状况，成年期时性伴侣的数量，以及自述的婚外性，更多的结果可以从第一作者J·卡塔尼亚新近完成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调查上述三个问题时，相对于标准型提问方式来说，增加的或者支持型的提问方式，对完成评估的目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一个处女状况的例子中，相对于标准型问题而言，支持型问题增加了男性的自述（37%—46%），但降低了女性自述的在青少年期保持了处女的比例（60%—55%）。第二个例子中，婚外性关系的影响依赖于访问者的性别。当应答者面对同性的访问者时，支持型的问题显著地提高了自述的婚外性的比例（16%—标准型问题12%）。但在面对异性访问者时，两种类型的问题得到的结果，没有显著性的区别。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成年时性伴侣的人数。这里，支持型的问题减少了应答者自述的性伴侣人数，42%的应答者自述有五个或者更多的伴侣，而标准型式问题中有47%。另外，支持型问题还增加了自述没有伴侣的人的比例（1%—标准型问题0.3%）。简而言之，问卷中包含更多的支持型的提问方式，产生了与预计的情况相一致的结果。但是，其它的因素如访问者的性别，也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影响。

问题顺序的影响

一个通常的假设是，问题的选项会逐步增加问题的敏感性，同时，更多的涉及隐私的选项逐步降低了主题敏感性。如果过早地提到敏感的题目会使测量误差增多。而且，应答者可能在这种访问的过程中，不愿意再回答了，或使问卷末尾部分的问题的测量误差加大。研究者要正确平衡访问的长度和问题的次序两者之间的关系，其重点就是应答者对于任务的理解和他们对于问题的真实的回答。

无论是采用自填问卷的方法，还是当面访谈的方法，先前的研究中都没有能够发现，问题的顺序是怎样影响有关性的问题的测量误差的。那些研究都是以大学学生和年轻成年人为样本，也许不能被推广到青春期的少年和其它年龄段的成年人。而且在那些调查中，性的问题并不是调查的焦点问题。但在那些调查中也发现，与其它资料收集方式相比，自填问卷法相对不易受到问题顺序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确定问题的顺序何时会对测量产生影响，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需要先理解，问题的次序是如何影响行为的社会意义的，进而影响应答者自我陈述中的偏差。研究者1970年的研究中发现，当问卷中有关行为的题目在前面，对婚外性关系的看法的问题在后面时，已婚夫妇自述有婚外性关系的比例更高。因此，正确的提问顺序可以打消应答者的疑虑，使他们认为在接受访问的情况下，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会承认有自己有一些在社会意义上不被赞同的行为。

人口普查中的问题：术语、意义、结构

性学研究中了解得最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不同的性行为选择可以使用的术语。有关艾滋病的调查都是以一个特定的人群为目标群体，如男同性恋者，静脉药物使用者，妓女等。那么，在提到某种特定的性活动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群体内部使用的俗语或者街头的语言。但是，目前对大众群体的调查，包括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调查实践中，都使用标准的术语，而不是街头俚语来指称某种活动，如阴道性交、肛交。正式的语言能更好地包容有地区差异的俗语和应答者各式各样的理解。但是，如果过多地使用本国的语言、英语的术语，或者滥用术语，都会引起应答者的不满。英国学者1994年和1998年进行的定性研究发现，可以使用大量的语言去描述性行为，如可以使用圣经上的用语、本国的语言、婉转的说法、浪漫的描述、世俗的称呼、科学的术语等等。

在大众人群的调查中，涉及到性行为的问题时，应答者如何理解调查使用的特定的术语？此方面的系统研究还非常有限。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应答者很少自愿说出他们不理解某个问题。他们经常是选择那个他们不怎么明白的选项，或者他们只回答他们确切明白其含义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调查者已经了解了各种人群使用的性的语言。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更大众化的、通用的、概括性的语言，或者知道的也许已经过时了。在我们先前提到的全国艾滋病行为调查中，使用了焦点组和电话预访的方法，发现应答者能够理解标准化的性的术语。1991年进行的性病自述研究发现，低收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青少年可以明白标准化的语言，如阴茎、阴道、肛门，但西班牙裔的妇女在理解时有一些困难。不可否认的是，社会阶层、文化和种族的不同，在接受或者理解术语的时候确实存在差异。如果我们忽略语言方面的差异，也许就会误解一些特定的行为，或者误解解剖学和医学上的术语，其结果是在调查中出现不恰当的或未完成的答案。

在全国艾滋病行为第二期调查中（N=4790），检验了应答者对性调查中普遍使用的典型词汇的理解。我们设置了一些问题，来评估应答者自述的他们对于词语（阴道性交、肛交）的理解力。绝大多数应答者（95%）认为，问卷中的词语非常容易理解。但反映理解有困难的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与白人应答者相比，更高比例的少数民族的应答者，反映难于理解阴道性交和肛交的含义。最震惊的是，我们发现在受教育年限少于12年的人中，有25%的人自述在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时有困难。更重要的是，那些反映难以理解词语含义的人，当被问到他们与多少个人有过阴道性交或肛交的时候，他们更可能答零。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政策中显示，一些应答者在调查时展现的性的积极主动性，低于他们事实的状况。那么可能在继续的程序中忽略了这一部分人群，没有进一步访问他们。

人们对性行为术语赋予的含义，是理解调查的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进行英国人的性行为研究之前，研究者使用深度访问的方法（in-depth interviews），探究了对全体人群进行性行为调查的可能性。他们的一个发现是关于语言的，即词语“性伴侣”的含义。虽然，“性伴侣”一般被解释为“和你发生过性关系的人”，但是已婚的和未婚的应答者为性伴侣这个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于已婚的男性和女性来说，他们不把自己的配偶称为性伴侣。因为他们认为，这看起来会限制或者轻视二人间的关系，即便他们的配偶符合性伴侣的定义。在未婚的人中，性伴侣这个词是和某种类型的关系相联系，而且通常不是指那种偶然的性关系，后者是“一夜情”。至于“性伴侣”这个词如何应用于有婚外性关系的已婚者，目前仍不清楚。他们是否也像未婚者那样使用性伴侣这个词语，仅用它来指称婚外的、且投入了感情的性伙伴。还是可能和未婚者不一样，用性伴侣来指称和他们发生过偶然的性关系的人。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应答者在理解性行为的术语的时候存在的各个方面的困难，和应答者赋予术语的个人的意义。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来说，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更好的理解调查的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的方案，包括让访问者把标准化的语言转译成应答者更熟悉的俗语，访问者用口语来描述问题中提到的性活动，或者给应答者出示问题中行为的图画。这些方法的作用也许是有限的，而且如果这样，也许会有一些应答者因为不好意思，而不去询问一个他们

不知道的性词汇的意思，或者对看到性行为的图解感到不适。在自填问卷的调查中，标准的和通俗的词语，会被制作成定义表，随问卷发放。但如果应答者存在阅读的困难，那么定义表的作用肯定会大打折扣。研究者已经发现，当要求应答者为标准化的性术语提出替代的词语时，这些替代的词汇（如使用做爱而不用阴道性交）会减少测量误差。由应答者自己提出性行为词语的效果，会由于不同人对语言熟悉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相对于调查使用的语言来说，调查中问题的结构对测量误差产生的影响更大。相对于短问题封闭答案来说，比较长的问题、开放型的答案要求更多的自我陈述。再有，使用熟悉的性的语言，其程度不好把握。一些应答者反映，在谈论性行为的时候，他们更乐于使用标准化的语言而不是通俗的俚语。如果询问应答者喜欢访问者使用何种类型的性术语，会给访问提出额外的要求，也不是自填问卷的目的。我们还需要做广泛的研究，来评估对标准化的性行为词语的理解，以及这些词语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同意义。

其它还有一些性的问题的提问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可以在问题中声明：调查中谈到的行为都是很普通的，这样可以降低应答者自我陈述中的偏见，他们往往认为调查到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再有，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先评估应答者是否存在某种性行为，然后再询问他有关这种行为的问题。因为有一部分没有某种行为的应答者对于他们被假设有此行为，会感到很不舒服，那么他们也许在余下的访问部分就不够合作了。但研究者也建议，对于一些社会舆论不认可的行为，最好先问应答者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行为，然后再提到这种行为目前不太受欢迎。在询问特定的个案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以上种种的方法仍需要通过试验加以确认。

方法的影响

艾滋病的调查项目使用了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在家中或在门诊部中的当面访谈，电话访问和自填问卷。虽然一些小规模的研究已经使用过日记法，但在大规模的艾滋病行为调查中，几乎没有用过日记法。

方法的影响的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基本问题：（1）一种给定方法的特性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测量误差的；（2）比较不同的收集资料方法，给测量误差带来的不同影响。虽然在其它众多的健康调查和行为调查中，已经检验了这两个基本的论题，但是在涉及性行为的调查时，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

不同的收集资料方法在以下几方面会有所不同：（1）应答者在回答有关性行为的问题时，会在多深的程度上涉及到他的个人隐私；（2）调查提供给应答者匿名的程度；（3）此项研究的可信性。可信性是由应答者来判断的，他会评价这些关于性行为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合理的用途，而不是仅仅是为了窥探他的隐私或者是什么其它罪恶的目的。如果应答者相信：调查者可以确认他们；可以把问卷中的答案和某个回答的人联系起来；可以在访问的时候看见或听见他们，那么应答者就会感觉匿名性和秘密性的程度低，反之则高。应答者对于可信性的理解也会不断变化。如果他们相信这个访问是合法的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此研究的可信性高；如果他们认为调查是一个恶作剧，或者代表着某种罪恶的目的，那么说明调查的可信性低。

更多的秘密性和匿名性，更高的可信性，大概会减少应答者在回答敏感问题时的测量误差。敏感问题就是那些使应答者感到具有胁迫的或者具有潜在否定的结果的问题。但对敏感主题的认定是一个相当主观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认为性行为的问题是具有胁迫性的，但另一些人却认为是无伤大雅的。

我们还不清楚，在询问性的问题时，一些收集资料的方法是否明确的优越于其它方法。各种方法提供了匿名性、私密性和可信性的不同的混合，具体取决于使用的交流通道（人与人之间的、视觉的、听觉的）和程序变化的数量（例如访问的长度，鉴定的材料）。相对于电话调查来说，当面访谈能够使访问者产生更高的可信性，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给应答者一些视觉的暗示，如出示介绍信和证明的徽章。当面访谈可以比电话访问的时间长一些，因此它有更多的时间帮助应答者相信访问者。因为减少了访问者和应答者之间的视觉接触，所以电话调查和自填问卷可以提高匿名性和私密性。也有些人认为电话访问比当面访谈有更高的可信性，因为他们恐惧要经常允许一个陌生人（访问者）进入他们的住宅。与此相对照，用电话访问进行性行为的调查，又必须与那种打淫秽电话的人相区别。访问者可以用提供回访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使用预约信，来增加电话调查中的可信性，消减应答者的疑虑。与口头访问的方法不同，自填问卷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变动，结合了私密性、可信性和匿名性三个特征。这依赖于应答者是在何种情况下接到和完成自填问卷的，例如是与一位为他的填答提供帮助的访问者面对面的，还是把问卷邮寄给应答者。虽然，人们对于不同方法的可信性和私密性有一种直觉，在性学调查中，可以直接测量应答者对于可信性和私密性的感觉，但这种直接的测量并不能转化为各种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198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希望找出优先选择何种资料收集的方法，但结果却成了对各种方法的评估，而且在询问性问题的过程中，还不能确定一种私密性、匿名性和可信性都高的特定的方法。

方法的比较研究中，都比较了自填问卷法、当面访谈法，和在性学调查中使用的电话调查技术。一般来说，自填问卷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自述的性行为，但是也产生了更多的缺失数据。电话访问和当面访问产生的缺失数据比较少，有一部分人在电话访问时会自述出稍微高一些层次的行为，但不是所有行为都有这样的结果。近来，更多的调查者已经开始探索其它的方法，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电话访问法、当面访谈法和自填问卷法。新发展的方法之一是计算机协助访问法（computer assisted self-interview technique, CASI），它融合了多种技术，比以前的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有声计算机协助访问法（audio-CASI）（应答者同时听磁带中播放的问题和看屏幕上打出来的字幕）给自填问卷提供了更多的私密性，因为不再需要对应答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了。再有，有声计算机协助访问法使只会一种语言的调查者能够组织多种语言的访问。研究发现，如果自填问卷被读出来，那么问卷中的漏答和跳答，会少于字面的问卷。同样，与字面问卷相比，有声问卷确认了更多的有传染艾滋病危险的行为。最后，与字面问卷和有声问卷相比，计算机协助访问法（应答者在屏幕上看到问题，计算机控制跳答）显示了用计算机帮助调查的优越性（如计算机可以执行复杂的跳答模式）。当应答者的阅读水平低于均值时，研究者在一小部分题目中比较了三种方法：声音图像计算机协助法（audio plus video-CASI）、图像计算机协助法（video only-CASI）、自填问卷法。结果发现，即便是对于不会使用计算机

的人，计算机协助法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要好于纸张的自填问卷法。计算机协助法减少了应答者在跳答时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应答者完成纸张的自填问卷时经常会发生。计算机系统同样提供了质量更高的数据（更少的“不知道”这样的回答），而且能够鼓励应答者回答完一些敏感的行为的问题。在两种计算机协助访问法中，应答者更喜欢，且优先选择声音图像法，因为它更有趣、易于操作。

访问者变量

当调查任务反映了包含于访问中的社会关系时，访问者的影响会特别地突出。因此，性学调查中的访问，对于访问者性别的影响，可能会特别的敏感。虽然自填问卷的调查减少了访问者的影响，电话调查限制了应答者推断的访问者的特征，但是访问者的影响仍然存在。自填问卷通常要在他人的管理下完成。而在电话访问中，访问者的声音和他所做的自我介绍，则明显成为了关于他性别的暗示。

先前的多项研究中都发现，在应答者回答性的问题时，访问者变量（性别、性取向、态度、年龄）产生的影响很小。但也有一些例外，表明了性别的差异对研究的影响。在性的问题上，人们一般和女性访问者谈得更多；女性应答者比男性应答者更容易受访问者性别的影响；应答者中的女性比男性更乐于谈到更多隐私的个人生活细节。

在性学调查方面，有关访问者因素的问题，已有文献为我们提供的指引很少。有研究者指出，相对于当面访谈而言，访问者因素在电话访问中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结论并不是权威性的定论。目前仍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配备与应答者有相同特征（如种族、性取向、性别、年龄等）的访问者。调查者仍未能充分了解，在性学调查中，对访问者角色的要求和角色的完成情况所产生的影响。目前仍然没有公认的标准，去判断访问者在做性学调查时的访问质量。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调查者目前使用的方法中，哪种方法可以提高涉性访问的质量。总之，研究者缺乏清晰的质量标准。例如，先前的多项研究中，关于访问者的性别对于访问的影响这个问题，产生了不一致的解释，就是源于此因。尽管声称有反例，但我们仍然认为，访问者不可能已经达到了同等的水平。

一项近期的研究检验了电话调查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访问者性别的问题；二是应答者通过选择访问者性别来控制访问的问题（参见附录二）。我们将在下面的部分讨论此项研究中的发现。

应答者控制

控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不明确的或者是潜在危险的情况下，能提高人们认识到自己处于能够控制情况下的任何事情，都会减少危险。反之，认识到自己处于不可预测的、消极结果的环境中，很可能会增加个人的无助感，因此增加忧伤。访问的条件有许多的不明确，和具有潜在威胁的事实，包括以下几方面：（1）应答者不确定将要发生什么，和问题到底是关于什么的；（2）应答者对访问者存在不确定，希望知道他们的可信性（这个人是真向他自己介绍的那样吗）；（3）应答者也许不确定，而且想知道调查者将会怎样使用收集到的资料，他们的私密性能被保护好吗。当访问涉及到高度敏感的性的话题时，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会增加，这很正常也很合理。因此，通过让应答者选择他的访问者的性别，来达到让应答者控制访问的目的，也许可以减少测量误差。

访问者的性别和应答者控制

在一项最近的方法论研究中，我们探究了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参见附录二）。应答者被随机地分成三组，第一组安排同性的访问员，第二组安排异性的访问员，第三组的应答者有机会自己选择访问员的性别。这三种情况的初步分析，提供给我们一些有趣的信息。例如，男性对同性访问员和异性访问员自述有同性的性活动的比例有显著差异（分别是6%和4%）；当男性可以选择他的访问员的性别时，得到一种中间的状态（4%）。在女性应答者那里发现了相似的模式，她们自述在过去的10年里同性的性行为的比例：同性访问员组4%，异性访问员组2%，自选访问员组3%。如果是询问女性生命历程中的同性性活动，那么三组的差异就不明显了：同性访问员组2%；异性访问员组2%；自选访问员组3%。在青春时期是否保持了处女，应答者的回答随访问员的性别和选择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影响取决于问问题的方式（第二项实验检验了性的问题的不同提问方法，参见附录二）。应答者自述“从没有使用过安全套”的比例，访问员性别的影响和选择同样依赖于问题的措辞方法，但还是可以描述出访问员性别的主要影响。例如，男性应答者面对同性访问员时（63%），比面对异性访问员时（57%），更乐于自述没有使用安全套。自由选择访问员组的应答者介于两种情况之间（60%）。对于女性应答者来说，选择访问员更重要了，对同性时72%自述没有使用安全套，另外两组都是69%。应答者自己选择访问员试验的初步结果是，男性应答者更愿意对同性的访问员自述有强奸和虐待的经历，以及婚外性关系的经历。自由选择访问员性别组的男性应答者同样乐于自述有关强奸和虐待的经历，以及一些其它性的问题，而且比男性同性访问员组的情况更明显。总之，我们的发现认为，应该在性别上使应答者和访问者相匹配。在特别敏感的话题上（如种族和性的问题），如果可以给应答者一个选择，让他自己决定由谁来访问他，那么将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在一个

大一些的范围内，访问员提问的方式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上面提到的那些影响。问题中包含有更多的支持问题，可以提高应答者、访问员配对和选择访问员方法的影响。

结论

本文中讨论的话题涉及了各种有争议地引入了性行为调查中的方法论问题。许多调查者已经做过了这个领域内的文献回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以做进一步的讨论。下面，我们要从前面的回顾中归纳结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概括来说是，众多的前沿问题中都需要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评估与艾滋病相关的性行为的研究。

虽然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出色的方法论研究，但是其中的许多工作需要在不同种族、不同年龄段和艾滋病危险人群中，重复检验。

在将来的调查中，应该做更多的、具有更高的协调一致性和系统性的，关于性行为的问题的和相关构想的预备研究。这项工作也许会给全部的计划增加成本，但相比来说，这个增加的成本还是最小的。否则我们调查中的问题，可能会让应答者觉得不可理解；或者调查者会抱怨应答者不能理解他们，那么这样的花费就更大。

调查前的一项先导工作是列出一个词汇表，包括性的术语和对一些性的词汇的理解，这些解释要适用于各种群体，使他们都能明白。而且当他们被问到或者回答有关他们性活动的问题时愿意使用这些词语。如果在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时，没有一个易于理解的、适合的术语，那么我们就难以解开影响测量误差的其它潜在因素。尽管在性学调查领域中，列词汇表的工作需要继续开展。但近来，调查者指出，对于大多数阶层的人来说，术语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任何研究中，术语的问题都应该通过严格的预备调查得到解决和支持。

同样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决定如何最好地向预期的应答者介绍与艾滋病相关的性学研究。调查者的介绍不但要减少应答者由于回答有关性的问题而产生的威胁感，而且要提高他们的参与率。

和其它类型的行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性学调查同样面临着回忆的正确性的问题。调查者需要检验各种变量因素，包括回忆的时间段、在过去的性事件中个人是否突出、与个人的性伴侣和行为相连的感情、任务的复杂性（例如，回忆与多个性伴侣发生的行为）、被评估的特定行为的频率、应答者参与这个活动的动机、应答者使用的提供他们行为估计的推论方法的类型，是如何影响回忆的准确性的。

同样，应该系统地检验提高回忆的不同方法，比较不同群体的性行为。例如可以比较对全部的性伴侣和对特定的伴侣；比较双时间框架问题法和事件历史日记法。

回顾评估法通常是唯一可以测量性行为的变化方法。应更多地研究简易同组法，用它回顾性地评估行为的变化。而且还应该发展其它的无偏的方法。

由于与艾滋病相关的性学调查的重点从个人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研究者应该系统地检验那些新的或者是不常用的方法（如日记法，回顾生命时间日历法，依据时间线索法）对性行为的评估，比较这些方法的内在效度和信度。

自我陈述的偏差，是调查者获得对应答者性行为正确评估的一个重要障碍。已有的研究认为，性学研究中，应答者对私密性的关注，问卷中问题的结构和用语可能会对应答者的自我陈述发生影响。这个结论还需要在不同的、与艾滋病相关的人群中进行检验。需要建立一种调查研究工作程序，以降低自我陈述的偏差和构造自我陈述偏差的相应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对测量误差的影响的研究也是需要的。研究者仍不清楚，性学调查中不同的方法在影响测量误差方面的优缺点。而此项工作又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实施一项调查的经费很高，这就限制了在一个时期内对危险行为有规律的监控的努力，即限制了二次调查和历时性调查。特别是随机抽样入户访谈成本高昂，如果所有的研究都基于访谈的方法，那么不可能达到所有需要的调查工作都能够获得经费来源的结果。电话和邮寄的自填问卷调查提供了低成本的替代方法。但是正如全国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报告中指出的，目前仍然没有充分地检验，这些低成本的、代替访谈的方法的局限性和优越性。

研究者同样应该继续检验，资料收集方法中偏差的影响的特性。在方法的研究中，需要检验访问员对测量误差的影响。几乎还没有调查者研究访问员在与艾滋病相关的性学研究中的影响。

发展自我陈述的性行为的更确切有效的方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的效度指标还不能够得到自我陈述的性行为的一对一的相关，如性病比率，安全套出售，精子的尿液分析。

更好地理解人们扮演应答者角色的动机，是很紧急的。我们如何测量应答者提供全部的和完整的信息的动机？我们如何更改相应的动机，为收集准确的性的信息去动员最有利的条件？

评估两性关系的问题是性学调查领域中的一个预备研究。虽然这个问题在有关婚姻的文献中被讨论过，但是两性的

分析研究工作仍在进行。

设计有效的预防程序越来越重要了，对这些程序的评估研究应该考虑到本文所讨论的这些方法论的问题。准确的和可信地评估行为产生变化的原因，也许需要更多的花费和更困难的历时性研究。当这种研究达不到的时候，可以使用简易同组法测量变化。

总之，在这个领域中需要开展的工作的数量是使人畏缩的，但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可以同时展开。例如，语义和记忆的研究课题可以很容易地和检验方法的影响的试验结合在一起，或者在一个大型的实验设计中，作为一个预备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后续的状况研究。重要的是，这个工作要在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不同种族和其它相关的危险人群（如静脉内药物使用者）中重复做。[\[1\]](#)

附录一

方法：发现变化的研究

调查分别询问了应答者和他所有的性伴侣，在发生阴道性交和肛交的时候，安全套的使用状况。而且两种方式的问题是一样的。调查主要是测量应答者行为的变化，探究他们在两次访问中是否有任何的改变。依据表二的标准，在小组纵向测量变化法和自述回想测量变化法中，通过“性伴侣数量”和“使用安全套”这两个问题，应答者被区分为“一致”和“不一致”两种。如果这两种方法测得的结果一致，那么在“不一致”组里的人就会很少。而且，在“一致”或者“不一致”组里的人数应该与自述有改变或者自述没改变的人数相等。如果回想法产生了偏差，那么不一致的应答者就是那些声称为了健康有改变，而实际上没有改变的人们。

表1：纵向同组法和回想法评估性伴侣的人数

	纵向同组法	回想法
第一次访问	在去年一年里，你一共与多少位男士/女士发生过性交的行为？	在去年，为了防止被传染上艾滋病，你的性行为有无改变？有/没有
第二次访问	在我们上次访问你之后（具体日期），你一共与多少位男士/女士发生过性交的行为？	在我们上次访问你之后（具体日期），为了防止被传染上艾滋病，你的性行为有无改变？（有/没有）你有没有减少你的性伴侣？（有/没有）

表2：纵向同组法和回想法评估安全套的使用

	纵向同组法	回想法
第一次访问	分别询问被访者第一位到第十位的性伴侣的情况：在去年一年里，你与你的这位性伴侣有多少次阴道性交？	在我们上次访问你之后（具体日期），为了防止被传染上艾滋病，你的性行为有无改变？（有/没有）你是更经常地使用安全套了吗？（是/不是）
	请回忆你所有的性交行为，你/你的性伴侣是否使用安全套呢？备选答案分有六个，从“每次都带”到“从来不用”。	
第二次访问	请分别回忆你的第一位到第十位性伴侣的情况：在我们上次访问你之后（具体日期），你与你的这位性伴侣有多少次阴道性交？	在我们上次访问你之后（具体日期），为了防止被传染上艾滋病，你的性行为有无改变？（有/没有）你是更经常地使用安全套了吗？（是/不是）
	请回忆你所有的性交行为，你/你的性伴侣是否使用安全套了呢？备选答案分有六个，从“每次都带”到“从来不用”。	

注：对所有的被访者，都要和上面一样，询问有关肛交的问题。

表3：详细说明变化：回想法的变化

纵向法的变化		是的, 为了健康	没有, 没有作出
		作了改变	任何健康保护的改变
	作出了健康保护的改变	相关	不相关
	没有改变	不相关	相关
	作出了会带来更大危险的改变	不相关	相关

表4: 回想法中一致的被访者人数与回想法和纵向法变化一致的被访者

回想自述行为有变化的被访者		
	是的, 性伴侣的	不, 没有减少
	人数减少了 (n=235)	性伴侣 (n=652)
回想法的变化和纵向法一致	47.2%	78.1%
回想法的变化和纵向法不一致	52.8%	21.9%

$$\chi^2 (1, N=887) = 78.0, p < 0.00001$$

表5: 回想法发现的安全套使用的变化——回想法与纵向法一致的被访者

	回想安全套使用有变化	
	是的, 增加了安全套	没有, 没有增加安全套
	使用的次数 (n=182)	的使用 (n=689)
回想法的变化和纵向法一致	63.7%	80.1%
回想法的变化和纵向法不一致	36.3%	19.9%

$$\chi^2 (1, N=890) = 21.6, p < 0.00001$$

表6: 回想法中性伴侣人数的变化——纵向法中性伴侣人数的变化

		回想法中性伴侣人数的变化	
		是的, 性伴侣的	不, 没有增加安全套
		人数减少了 (n=235)	的使用 (n=652)
纵向法	降低	47.2%	21.9%
性伴侣的人数	保持不变	31.1%	57.5%
	增加	21.7%	20.6%

表7: 回想法安全套使用的变化——纵向法安全套使用的变化

		回想法安全套使用的变化	
		是的, 增加了安全套	不, 没有增加安全套
		的使用 (n=182)	的使用 (n=689)
纵向法安全套	增加	63.7%	19.9%
的使用变化	保持不变	12.1%	14.2%
	减少	24.2%	65.9%

全国有关艾滋病行为的方法论研究

这个研究包括下面三个步骤：随机抽取街区，三步操作处理（选取应答者，选择访问员，问卷设计），把住宅电话号码分配为18种情况（3种选择应答者的方法，3种访问者的选择，2种问卷的版本）。这种设计能够消除，或者至少是减少了当需要访问员去为应答者指派条件的时候，访问员所产生的偏差。因为当得到一个可用的住户的号码的时候，才需要分配实验的条件，之后把说明和问卷寄给样本，称为记录表，访问员很少有机会和原因去偏离随机的程序。所有的访问员都不知道研究假设。一篇已完成的论文提供了有关访问员和问卷试验的资料，另一篇目前还在写作的论文描述了全部的列举试验。

在对访问员进行研究的这部分，合格的应答者被随机地分配给以下情况中的一种：同性访问员，异性访问员，自由选择访问员。为了尽可能平稳地从应答者选择向访问员选择转换，访问员的选择过程被合并并在问卷的开头。在选择的情况下，访问员要告知有选择权的应答者，

“因为我们下面要问到的问题，有一些是针对您个人的，您可以选择您所希望的访问员。我们已经发现，有一些人喜欢选择男性访问员，而另一些人选择女性访问员。您愿意和一位男性还是女性的访问员来交谈呢？”

如果应答者拒绝选择，那我们将再问他一遍，

“因为有一些问题是很私人化的，我们希望能使您感到这个访问轻松愉快。请告诉我，您愿意选择一位男性还是女性的访问员。”

如果应答者还是没有选择，那么将为他随机指定访问员的性别，而且应答者还有机会选择。（注意：我们的分析检验了，选择是否存在唯一的影响，还是拒绝选择访问员的性别会产生独特的影响。）在所有三种选择情况中，如果先前的访问员不是应答者所选择的性别，那么他会对应答者说，

“请稍等，我去请符合您的选择的人来继续对您的访问。”如果应答者问，“为什么”，那么访问员说，“我目前的经验还不足，所以我只负责开头的部分。”

为了分析的目的，如果异性访问员和同性访问员的条件，在一个给定的分析中，被证明没有显著的影响，那么这两种情况可以被合并为一种不选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异性访问员和同性访问员都可以作为例证证明，应答者对于访问员没有性别要求）。

在问卷研究部分，应答者同样有两种选择问卷的条件：支持型和标准型。标准问卷以调查者目前使用的调查项目为基础，主要是在艾滋病和性学领域的，由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开展的，关于家庭成长的全国调查，和其它近期的全国性或州内进行的关于艾滋病和性学的调查。目前的问卷中，每个目标项目的确切语言表述都在下表中列出。支持型的项目是以先前的工作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研究者在这个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自己做了一些向导性的研究。与标准型项目相比，支持型项目的一般目的是：访问者更少的判断，向应答者提供更多积极的或消极的问题转换。两种问卷实施的均值如下：支持型项目平均20.7分钟，SD=5.2；标准型项目平均19.0分钟，SD=5.1。两种测量方法没有显著性的差别（ $p>.10$ ）。

表8：问卷结构：支持型情况和标准型情况

支持的问题	标准的问题
首次性交的年龄	首次性交的年龄

<p>人们开始有性生活的年龄各不相同。有些人也许小的时候就有了性交的活动，而另一些人是在十几岁开始的，有一些人直到成年才有性经验，还有一些人决定终生保持童贞。请问您第一次和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是多大？</p>	<p>当你第一次和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是多大？</p>
<p>性伴侣的数量</p> <p>关于性伴侣的数量，人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人说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性伴侣，有些说有两个或者更多，还有一些人说有一百多个性伴侣。</p> <p>18岁以前，你和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p> <p>18岁之后，你与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p> <p>（在后面还有5个地方会询问不同时期的性伴侣数目，包括最近6个月的。）</p>	<p>性伴侣的数量</p> <p>在标准型的问题中，没有相应的介绍的内容。</p> <p>18岁以前，你和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p> <p>18岁之后，你与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p> <p>（在后面还有5个地方会询问不同时期的性伴侣数目，包括最近6个月的。）</p>
<p>婚外性行为</p> <p>许多人认为，对于自己的伴侣保持性的忠诚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即便是那些认为保持忠诚很重要的人，仍然发现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了性关系。在你结婚以后，在最近的这十年中，无论是何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与自己配偶以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p>	<p>婚外性行为</p> <p>在你结婚以后，在最近的这十年中，无论是何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与自己配偶以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p>

[1]原文《艾滋病时代性行为的研究方法》，JOSEPH A. CATANIA, DIANE BINSON, ARIANE VAN DER STRATEN, & VALERIE STONE, 翻译：董研。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